

《三国演义》与佛教

赵 晓 晖

〈Summa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and Budd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plot and thought, and points out that, though littl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is affected by Buddhism. The thought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combined with Confucianism, become the common thought of Chinese people and influence their aesthetic mentality, which is reflected in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人们耳熟能详的长篇小说而言，《西游记》自不待言，《金瓶梅》、《红楼梦》与佛教颇多因缘，《水浒传》中也有不少和佛教有关的人物与情节，似乎只有《三国演义》与佛教的关系少之又少，这是为何？《三国演义》与佛教究竟有无关系？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三国演义》中佛教因素较少的原因

《三国演义》成书虽然在明朝，但描写的是东汉末年三国纷争的故事，一般公认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两汉之间，因此毋庸置疑，三国时期已有佛教在中国流传。那为何佛教在《三国演义》中不甚突出呢？合理的解释是三国时期，佛教在汉地尚未站稳脚跟，在当时影响尚不甚大；加之彼时道教兴起，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国演义》开篇描述的黄巾起义就是借助道教发起的，小说中人物张鲁本身就是“五斗米道”的第三代传人，后文中又有多起灵异事件与道教相关，就连诸葛亮本人，也是一副半儒半道的形象。虽然三国时期有康僧会游吴，译经大师支谶避乱江南，但一直到晋室南渡，鸠摩罗什入华，佛学在北方才发展起来；南北朝五胡乱华，佛教大兴。虽然作者罗贯中生在元末明初，彼时佛教对中华文化已浸润极深，但从历史事实出发，《三国演义》所叙述的故事，不像其他几部，背景都是佛学深入中国以后的事。因此，《三国演义》中佛教因素较少，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与佛教

然而，这并不是说《三国演义》与佛教毫无关系。事实上，《三国演义》佛教的关系尽管不是那么明显，依然割舍不断。这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以及思想倾向等几个方面。

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正面出场的佛教徒只有一人，此人出场两次，法名普净。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在第三关汜水关的镇国寺，遇见了同乡人普净。僧人普净暗示关羽，使得关羽逃脱了卞喜的毒手。普净随后往他处云游而去。后来，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被俘遇害，还有一段“玉泉山关公显圣”：“关公一魂不散，荡荡悠悠，直到一处：乃荆门当阳县一座山，名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净，原是汜水关镇国寺中长老。”普净听到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认得是关公，说：就这样算了吧，该放就放；凡事有因必有果。你现在被吕蒙杀了，大呼还我头来，可颜良、文丑等其他众人之头，又将向谁要啊？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玉泉寺如今尚在，位于现在湖北省当阳市城西南12公里的玉泉山东麓。但是，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不见于正史记载，纯属虚构。所以，普净也是虚构的人物，只有玉泉寺是真的。

在《三国演义》的诸多人物形象中，与佛教关系最大者莫过于关羽。关羽是《三国演义》中最为丰满、生动的形象之一，由于他勇武忠义，被毛宗岗评为三国三绝之一，说他“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¹⁾。历史人物关羽远不及小说形象丰富、完美，尤其是对关羽结局的处理，史书和小说大不相同，据《三国志》记载：“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追谥壮缪侯”²⁾，裴松之的注引述了《蜀记》的记载，说“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³⁾由此可见，关羽乃是兵败被杀，历史上也从未皈依佛教。那么，从历史上真实的关羽，到《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为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关羽与佛教相关联的传说由来已久，早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佺所作的《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中就有关羽助智顓大师修建玉泉寺的记述：“陈光大中，智顓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坊，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前壑震动，风号雷虩，前劈巨岭，下湮澄潭，良材丛木，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⁴⁾这里的神，指的就是关羽。唐人道宣所作的《续高僧传·智顓传》中尚未提及关羽助建佛寺一说，董佺之文可以说是目前所知的关羽出现在佛教故事中的最早记载。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关于关羽与佛教相关联的传说，至少在唐代中期，即董佺作这篇庙记之前，就已经在玉泉寺一带广为流传了。北宋张商英《重建当阳武庙记》内容更加详尽，详细记述了关羽与智顓大师斗法的过程，斗法失败后，关羽不仅舍玉泉山修建佛寺，而且一心拜服，受戒于智顓大师。到了南宋，僧人志磐作《佛祖统纪·智顓大师传》时，关羽皈依佛门、建造寺庙的故事，已经被当作智顓大师生平经历的一部分来记述了。元代，关羽在佛教中的地位已经得到朝廷的认可。《元史》记载，从至元七年以后，“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

甲马五百人，抬昇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昇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⁵⁾可见，世祖忽必烈时，关羽已经晋升为国家级祭祀所要请的神了。《三国演义》产生在元末明初，当时关羽在佛教中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很多寺院的伽蓝殿都供奉有关羽的神像，作者之所以在《三国演义》中给关羽设计了一个富有宗教色彩的结局，无疑是受关羽在佛教中的地位影响。但罗贯中在创作时做了两处改正，一是将关羽玉泉山显圣的时间提前到了三国时期，二是以智顓大师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形象“普净”。这样的设计使小说故事情节紧凑，并大大增强了小说结构的逻辑性。

《三国演义》中人物众多，为何单单关羽能与佛教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这主要是由于关羽的忠义形象在民间拥有极大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鉴于关羽形象在民间的影响力，以及他与佛教伽蓝神形象的契合，佛教的传播者对关羽进行了改造，并纳入佛教体系，随着他影响力的扩大，他在佛教中的形象也由最初的支持佛法，渐渐被演变成了护法伽蓝神，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佛教原有的十八个伽蓝神，在中国绝大多数寺院中享受供奉，为佛教吸纳了大量的信徒。

综上所述，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皈依佛门的宗教色彩，这不是罗贯中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的真实反映。小说这样处理，应该说是历史因素和小说创作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与佛教

《三国演义》中提到了一些佛教寺院，包括曹操父亲曹嵩被杀的地点一座旧寺、普净救关公的地点汜水关镇国寺、刘备到东吴相亲的所在地甘露寺等，但基本上都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与情节关系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脱胎于《三国志》，中间又经过了《全相三国志平话》等话本及戏曲的演进，在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中国人的一些观念。因缘、宿命乃至神鬼灵异往往渗入到情节之中，甚至成为推动情节发展，解决矛盾纠葛的动因。早在宋代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刘季杀了项羽，立着国号曰汉。只因疑忌功臣，如韩王信、彭越、陈豨之徒，皆不免族灭诛夷。这三个功臣抱屈衔冤，诉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着一个曹操，彭越去孙家托生做着一个孙权，陈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一个刘备。这三个分了他的天下……

可见，这里体现的是因果报应的思想。《全相三国志平话》里面的说法与此相同，开篇第一章的标题即是“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夺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同样把历史演进套进了因果报应、灵魂不死的圈子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唐末五代，佛教成熟，大行天下，“俗讲”和“变文”成为佛教向社会传播的主要形式，早期的白话小说，以宋元话本为例，受其影响甚深。作为《三国演义》的早期形式，《三国志平话》等作为面向普通民众说书讲史的底本，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也必须迎合普通民众的审美需求。因此，其中出现因果报应等内容也是不足为奇的。

到了《三国演义》，这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因果报应没有了，开头变成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的艺术品格与罗贯中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据考证，他7岁开始，就在私塾学四书五经。14岁时母亲病故，于是辍学随父亲去苏州、杭州一带做生意。但是罗贯中对商业不感兴趣，在父亲的同意下，他到慈溪随当时的著名学者赵宝丰学习，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罗贯中辞别赵宝丰，到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幕府作宾。明人王圻在《稗史汇编》中，称他“有志图王”；清顾苓《塔影园集》卷四《跋水浒传》记载“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都表明罗贯中在元末曾经想有所作为，“传神稗史”只是在现实中失败后无奈的选择。罗贯中的身上，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气质，而非“四大皆空”的佛家思想，因此他抛弃了《三国志平话》那种明显虚假的因果报应式开头，代之以充满大气的“天下之大势”，使全书的艺术品格得到了提升。国家“合”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分”，“分”到一定阶段又要“合”，历史是循环，这是天数、天意。尘世间的一切，战争胜败，朝代更叠，人的生死祸福皆由天意安排。天意不可违抗，否则，即使聪明如诸葛亮，也只能落得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下场。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崇拜，在传统儒家思想之中就有体现，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一番演绎之后，更是深入人心。但中国的情况有些复杂，对老百姓来说，儒家学说、佛教思想、道教观点是结合在一起的，各家理论及其作用在他们心目中也十分相似。故而无论何种宗教，只要人们觉得可以帮助自己消灾弥祸、解除困扰，便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一样地烧香礼拜。久而久之，这种混乱而宽容的宗教态度，使极具中国特色的三教合一有了生存的土壤。而儒、释、道之间的相互吸纳与渗透，又终于促成了三教合一局面的实现。这种奇特的宗教现象不仅造成了中华民族不坚信一神却虔信众神的特殊的、矛盾的宗教心理，而且给素与民俗文化有天然联系的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具体到《三国演义》，应该说追求事功、奋发有为的儒家思想是占有优势地位的，但与“天命观”、“宿命论”相应，道与佛在小说中同样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书中神仙鬼怪、妖法道术的故事比比皆是。例如开篇所列举的汉末诸多异象，书中反复验证的多次占卜等，都是中国人宗教观念的综合反映。再如孙策斩杀于吉、左慈戏曹操、诸葛亮七星坛祭风、五丈原禳星等都与道教有关。直接与佛教有关的描写虽然不多，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的灵魂不灭、转世轮回思想同土生土长的道教的鬼魂观念相结合，又衍化发展了儒家的相关理论，结果总是种善因获乐果，种恶因获苦果，民众对此坚信不疑。这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因果报应观被《三国演义》生动地体现在诸多情节中。例如董卓无恶不作，残害百姓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对前来投降的军民“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董卓死后，他的尸首只剩下零碎皮骨。下葬又遇“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天

之怒卓，可谓甚矣！”曹操不信鬼神，触犯了天条，上天大怒，结果曹操的结局是得病不治而亡；更有甚者，书中还描写了在他临死之前还听到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等人的“索命之声”。不仅如此，第一百零九回罗贯中将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捉杀张皇后、废魏主曹芳等恶行看作是对曹操昔日恶行的报应。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因果报应思想既与佛教相关，却又不完全相同。其实，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就有“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说，《周易·坤·文言》中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在《大学》中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用违背情理的手法得到的财物，也会不合情理地失去。中国人早就认为在人类的世界中，冥冥中似乎始终有一个无形的规律在主持仲裁着善恶是非，不管人类有怎样的权谋智巧，毕竟逃不出这个因果定律。天道循环，因果不爽，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此话正反映出宇宙间一种永恒的因果律，中国历史上无数事例，都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条规律。可以说，中国儒家思想的纲常伦理之中，早就有了因果报应的种子。但是，现实生活也不完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的向善之心不免受到动摇，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幻想，寄托于来世，这与后来传入的佛教思想一拍即合。正如《涅槃经·憍陈如品》所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所以佛法劝人一心向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有专家指出，佛教提出的业报轮回观念，与儒家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就是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相互责任，转变为每个人的个人责任。⁶⁾从这一点来看，前文所述《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开头，以及《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恶行被报应到了他的子孙身上，虽然披着佛教的外衣，骨子里还掺杂着儒家的思想。

总之，《三国演义》中佛道两家观念的区分是模糊的，而事实上，中国的佛教和道教杂处而生，它们的理论难以划分得清。原本属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被道家吸收；道教宣扬修炼成仙，佛家也说修炼成佛，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浸染着儒家思想的血液，佛道两派的思想精髓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融合为一，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心态。书中这些因果报应的奇异情节使小说增添了一种神秘奇幻的色彩，顺应了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这也是《三国演义》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与佛教

如果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体现的是一种“天命观”，谁也无法阻止的话，所谓“天命”，究竟是什么呢？《诗经·大雅·文王》中说：“天命无常”；《周书》中也说：“天命无常，修德为要。”荀子虽然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那说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如果说，在文王时代，人们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还包含着对于“天命”本身有所怀疑的话，经过“殷周之变”的洗礼，经过无数次改朝换代的更迭，到了罗贯中所处的元末明初，人们对于“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天命无常”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政权可以理所当然

地千秋永固、万世长存。中外经典，在叙述宇宙间的永恒规律时，有相通共鸣之处。在“天命无常”这个观念上，儒家思想和佛教理论找到了共鸣。

无常观是佛教教理的特征之一。它主张，世间万象生成灭亡，诸行无常，是人所不能左右的，世事的不变只是暂时和相对的，世事的变化无常才是绝对的、永久的。《三国演义》的开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与此颇多契合之处。清人毛宗岗父子在评刻《三国演义》时，将明代文学家杨慎所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放在了全书的开篇卷首，可谓“点睛”之笔，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全词洋溢着一股浓浓的佛教思想，特别是“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句，豪迈、悲壮，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泊、轻视。加之全书所展示的蜀汉集团的覆灭以及曹魏集团的兴衰等，无不深刻地揭示出了“世事无常”的佛理。有人将其与日本文学中的名篇《平家物语》相比照，《平家物语》在成书过程、故事内容等方面与《三国演义》颇多类似，它同样是由说唱文本发展而来，成书于十三世纪上半叶，较《三国演义》早一百多年。该书前6卷描写了平氏家族的荣华鼎盛和骄奢霸道；后7卷着重描述了源、平两大武士集团大战的经过，渲染了平氏家族终被消灭的悲惨结局，特别是出色地描绘了两氏之间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可以说是一部宏伟的英雄叙事诗，素有日本的《三国演义》之称。全书的开场，也是一首诗：

祇园精舍钟声响，
诉说世事本无常；
沙罗双树花失色，
盛者必衰若沧桑。
骄奢主人不长久，
好似春夜梦一场。
强梁霸道终殄灭，
恰如风前尘土扬。

这一诗篇诉说着“诸行无常”，在日本可谓脍炙人口。从“祇园精舍”、“沙罗双树”、“盛者必衰”这些词句中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无常”来自佛教，而这种“诸行无常”的观念是《平家物语》的基调，贯穿在整个作品之中。平家灭亡后，平清盛之妻平时子抱着外孙安德天皇与三神器一同跳海，更让人有世事无常、盛者必衰之感。然而《三国演义》中表现的“无常观”又与《平家物语》有所不同，虽然《三国演义》是在慨叹人生无常，但其整部作品的主题却是在揭露社会的弊端，作者把人生的无常归结于社会的现实和腐朽的政治，在无常面前，人类是有可为的，只要顺应时势

便可不违天命，消解社会矛盾便可化解无常。在《平家物语》中的“无常观”探究的则是生命本身的无常，决定历史变迁的因素是无常本身而非社会，无常是非外力所能左右的，无法加以改变和化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家物语》所体现的无常观更贴近佛教本义，这与它的集体创作背景及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国演义》这种以具有儒家思想倾向的“无常”观也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作者罗贯中的成长经历中找到根源。《三国演义》成书之际，民族矛盾尖锐，阶级压迫深重，社会动荡不安。求神拜佛，成为众多不幸者主要的精神依托。元统治者以尊崇道教、崇尚佛教而著名，明王朝对宗教也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这一切都为《三国演义》中宗教意识的张扬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由于经过上千年的浸染，在社会占主流的，还是儒家思想。儒家的核心思想是“礼”与“仁”相结合的道德规范，提倡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其崇德、仁义和治世的精神不仅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也深入到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领域，主宰着众多艺术家的创作取向。“有志图王”的早期经历与其晚年的特殊心境，是罗贯中偏好政治历史题材小说，并在这类小说上取得艺术成功的关键。尺蠖斋评释的《西晋志传通俗演义》序文也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当然，这句话用在《三国演义》上也是适用的。罗贯中无法隔断来自主客观的、根基深厚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难以彻底地跳出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樊篱。对国家，罗贯中强调施行“仁政”、“王道”，国家应由明君圣主来领导；对个人，罗贯中重视仁、义、礼、智、信、勇、诚等品德。这在他笔下一系列赞美的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然而，如前所述，佛教传入中国后，给儒学做了补充，在中国三教合流，儒家思想与佛教观念又很难截然分开，例如儒家“仁义”观念就和佛教中的“慈悲”之心颇有共通之处，儒家说仁者无敌，佛家说慈悲没有敌人；儒家说杀身成仁，佛家说慈悲无我；儒家说舍生取义，佛家（地藏菩萨）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又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时有这个因素，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在家是小孝，出家则是大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人人皆可为尧舜”，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的平等，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扩大为众生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就因果报应、“无常”观念来说，两者也有类似，这也就造成了《三国演义》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儒佛兼备的复杂性。王志远指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⁷¹可以说，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过程中所流露出的儒释道合流的宗教意识并非罗贯中个人的独特感受，它是中国历代文人普遍具有的思想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宗教心理意识的反映。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三国演义》涉及佛教较少，但绝不是与佛教毫无关系。佛道两派的思想精髓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融合为一，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思想观念和审美心态，这在《三国演义》中也得到了体现。

注

- 1) 罗贯中：《三国演义》，毛宗岗评，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页。
- 2) 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9页。
- 3) 同上。
- 4) 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001页。
- 5)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26页。
- 6) 王志远：《佛教带来的礼物：因果观念对中国影响最大》，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4/29/c_1262818_2.htm
- 7) 同上。

参考文献

- 罗贯中：《三国演义》，毛宗岗评，中华书局2009年版。
-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周启明，申非译：《平家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傅承洲，马小溪：《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 陈彩玲：《论〈三国演义〉的宗教意识》，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 邵东波：《〈三国演义〉的宗教观》，载《安徽文学》，2011年第3期。
- 刘斌：《论〈三国演义〉中的道家思想》，载《商业文化》，2009年第3期。
- 张淼：《〈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无常观之比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 杨林战：《道教和佛教的因缘》，http://www.ayrbs.com/index/2014-02/26/content_1139018.htm
- 王志远：《佛教带来的礼物：因果观念对中国影响最大》，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4/29/c_1262818.htm